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亲历者言】	我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李雪峰·李海文
【见证历史】	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宋双来
【往事非烟】	漫长的告别	郝新平
【亡灵祭坛】	北大子弟沈因立的决绝选择	周 锤
【痛定思痛】	在“纪念邓拓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	杜导正
【前车之鉴】	人性还是党性？文革大屠杀反思	赵越胜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亲历者言】

我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 李雪峰·李海文 •

李雪峰口述、李海文采写

时间：1994年6月

（李雪峰（1907年1月19日—2003年3月15日），生于山西省永济县，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1983年6月李雪峰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庐山会议开幕

1970年8月16日中办来通知，让我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18日我和陈毅等一起坐飞机飞汉口。陈毅当时在石家庄下放。我们到汉口稍事休息飞九江，由九江乘车至牯岭。上山时，路正在修，还未完全修好，遇到车子不能走的地方，我们下车一起走路。当天住在牯岭。陈伯达住熊式辉的房子，我住在他的下面，隔一条路。李富春、陈毅都住在我们的上面。我和陈毅都不了解情况，去了之后还休息了两三天。19日上午游仙人洞，下午到含鄱口。19日晚会餐，华北组到齐。华北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我是组长，吴德、解学恭是副组长，我的秘书黄道霞兼华北组的秘书。

21日大会发了6个文件，关于宪法草案和计划工作。22日召开了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理介绍了二中全会的议程，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过程。

后来批判林彪时我才知道22日晚政治局常委在主席的住处开会，决定第二天开幕式主席主持，周总理、康生发言，林彪并没有说要发言。林第二天在大会发言是突然袭击。

23日下午4时半，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主席主持，林彪坐在主席身边，林彪对主席说，他想讲话。主席把手重重地从上向下一挥说：你讲。看样子主席已有准备。林彪讲了一通，说毛泽东思想伟大等。他的讲话没有涉及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然后总理讲会议议程，议程有三项：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讲宪法修改情况。

23日晚8时，总理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开会，总理住在楼上，会议室设在楼下。里面摆了一圈沙发，外面两旁是桌子。我坐在沙发上，靠着进门的地方。关于计划的文件很大，只好放在腿上。天气很热，我用扇子扇着。江青挨着我坐，就来干涉：我怕风，你别扇了。我赶快拿着文件坐到后面，将文件放在桌子上。

总理还是按原计划，讨论计划工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总理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吴德已向外出，走到门口了。突然，吴法宪来了个动议，他提议：林副主席今天讲话很好，很重要，提议明天我们讨论学习一下，要求会议再播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

总理马上喊住大家，同志们又都回来，有的坐下了，有的未坐下来。总理宣布了一下，谁也没有表示异议。

24日上午在礼堂开大会，总理、叶帅都去了。总理坐在台下，汪东兴请总理主持，总理要他主持。所谓主持就是放录音。录音并不长。录音听了两遍，并通知各组，从下午起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

#### ◇ 陈伯达、汪东兴的活动

下午分大组讨论林彪的录音。我们华北组讨论时出了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入座了，我已宣布开会，陈伯达、汪东兴一块进来。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块来，这是过去没有的。

陈伯达来了就对我说：我要讲话。本来，马福全已在发言，当然他要讲嘛就只好草草结束，由陈伯达讲了。他就讲天才论。他讲，汪东兴插话，两个人一唱一和。他讲完了，汪东兴又发言，汪讲的内容就是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他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一边讲一边做动作。

到会的同志很难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内幕。他们这么一讲，一下子将会场的气氛煽动起来。开始讨论，只有十几个人发言。大家发言的内容自然受到这两位中央领导人的影响。后来批判时说郑维山第一个发言，其实他是第七个发言。钱学森等人先讲的。陈毅也讲了话，他说：我不信，我犯了错误，我连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利都没有了！我当时感到突然。我一直没有讲话。幸亏没有讲话，讲了就糟了。但没讲也糟了！

陈伯达讲完后就把稿子交给记录，说单独发他讲话简报。一会他又说要改，又把讲稿要走了。临散会时，记录的同志向陈伯达要稿子。陈说还想改改，说完了就在桌上改。过了一会儿又说：等着，要拿回去改，晚上再给。记录说：晚上出简报要用，最好早点给。陈伯达说：不行。记录又和他定时间，什么时间去拿。记录又同他商量是专出，还是出综合简报。他讲专出。这样6号简报上用括号注明陈伯达参加了会，单发他的简报。直到晚间12时左右，简报同志还给陈伯达的秘书打了电话催过，但仍然说没改好，先等着。因此6号简报没再写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因为陈的单发，免得重复。

会议结束后，汪东兴又有活动。

散会了，我们都往外走，陈毅找汪东兴要说什么。汪挥挥手说：你走吧，没有你的事。

汪东兴甩开陈毅，追上我、吴德、解学恭三个人说：“同志，情况严重呀！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要整枪杆子，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这个意思很明显，文革小组是笔杆子嘛。

我们一听，心想，出了大事了。我们三个赶快站住，急忙问：“主席知道吗？”

他答：“知道。”他讲完就走了。谁知陈伯达骗了我们，汪也骗了我们。

留下我们三个人，心中很不安，心想：这么就糟了。我还想：不像啊，昨天晚上开会没有什么迹象，怎么一下子就变了。

原来通知晚上开政治局会议，这时说停开了。又开大组会讨论。讨论结束，吃夜宵，别人都休息了，我们三个人一直坐在那，都讲：怎么回事？谁闹腾呢？谁也没有更多的话。各人想各人的，三个人都有所猜测，没有一个人讲出来。因为大家都懂得党内斗争的纪律。谁都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而且谁敢在会上反对毛主席呢？

当时的情况是迷信加毫无信息。

我们三个人坐到深夜12点多了，黄道霞拿着综合简报来找我们。我们说：有事。他在外面等了一会进来，说陈伯达的稿子一直没有拿到，他要专出一期。现在综合简报写好了。本来，简报晚上8点左右就写出来了，当时在会场要交我时，我叫他等等。因为我当时正在主持会，没法看；同时，也考虑情况严重，得再看看，再想想，所以已经拖了三四个小时。

我接过简报没有看，交给解学恭。他也没有细看，只是将陈毅的话单列了一段，把括号里面说陈伯达简报单独发勾掉了。又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交给吴德。吴德说：还要看？我说：按照规定还要签字。吴德说：不看了，签个字吧。就这样大家签了字。

这个简报送到会议的简报组，简报组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负责，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全面负责的。他们专门召集简报组同志开过一个会，要求简报要及时、快、简单明了，好话、坏话都要上，有文必录，不要报喜不报忧。这份简报从大会排是6号简报，从华北组排是2号简报。简报稿深夜1时才送到中办，可是编号超前，并压下已编号的4号、5号不排，6号提前排印，大清早五六时就发到一些人手上了，到今也没弄清楚这是中办什么人这样快印快发的！

◇ 毛主席的手冰冷

25日午间，主席通知开会。我将主持大组会议的工作交给吴德，就到主席那里开会。

这个会十分有趣，现在只有东北军区司令陈锡联、李德生、汪东兴和我四个人知道了。

叶帅、南京军区许世友、东北军区的陈锡联到了，总理晚到一会儿，康生、陈伯达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林彪那一伙也都到了。原来6个大区书记，柯庆施死了，刘澜涛、陶铸、李井泉、宋任穷都垮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这次参加会议的是政治局常委加各大组的组长。汪东兴是这次会议的主角。我去得比较早，我进去时许世友已到了，他到主席那。这时其他人陆续都到了。

许世友从主席那出来说：他来时一看会场没有人，他在门口踱步。主席发现他来了，就喊他：“你来，你来。”他走过去和主席握手，发觉主席的手很冷。主席说：“你看我的手。”汪东兴站在旁边。许说：一看就是主席和汪东兴吵了架。

主席对汪东兴说：“你是我身边的办公厅主任，你讲话人家就容易信。”

汪说：“我算啥，我不过是小小办公厅的主任嘛。”

主席说：“你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噢！我给你讲了好多次，不设国家主席。”

汪东兴说：“我思想不通嘛。”

许世友跑到汪东兴跟前说：“老汪，你不要讲话了，你看主席气成什么样子了。”汪东兴不管。

许世友讲到这，汪东兴从后面出来了，他来了就解释，说：“咱们国家应该有主席，主席就是国家主席。”他刚和主席吵了架，现在仍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康生劝汪东兴：“我们给主席反映东西，主席传达指示都是经过你的。主席讲他不当国家主席，你给我们说的嘛。”

汪仍说：“我思想不通嘛。”

总理也讲：“是啊，主席指示是你传达的。”

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思想不通嘛。”

这时林彪到了，他一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到后面主席那。谁也不知道林和主席谈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林从后面回来，林讲了一番话，他是从正面讲，没有涉及到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不是针锋相对。他那个位置，那个水平是不会讲得那么露骨的。

他还未讲完，主席来了，来了就问：“你讲什么呢？”

林彪打住了。

主席说：“你讲嘛，你再讲嘛。”

林说：“我已讲完了。”

主席说：“讲，大家讲。”

陈伯达站起来要解释，刚开口，主席一下子也站起来：“我不听你的谣言诡辩！”

我和陈伯达挨着坐。主席对他讲完就对我说：“你们那个组抢先出简报，你当组长就不管事？！”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没有讲话，也无法讲话。

其他人都没有讲话，表态也不好表，也搞不清楚

情况，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主席宣布散会。

我马上请示问：怎么办？因为大组的小组会还未完。

总理、林彪请示主席。

主席说：“6号简报停发。会议停开，简报收回。”

散会时我跟在总理后面，想和他谈谈，看见总理和林彪边走边商量，我也未听清人家说啥。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专政二天半的情况。

散会后，我一直想简报发后各地有反映。主席批我抢先出简报，简报送到他那是早上5点。其实我们没有抢先嘛，我们怎么能抢先呢？什么人批准印，什么人批发我都不知道，都是汪东兴掌握着。主席讲：你当组长不管事，这是对的。我没有把住关，我也没有把关，根本没有细看。

晚上9点，通知我们：政治局在总理那开会。后来又通知我们等着。一直等到凌晨4点，陈锡联来个电话，问我有何消息。我说也没有消息。他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入睡了。我一直等了一夜也未开会。以后据说，总理找林彪谈话，又到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讲了话，他又去找林彪，再向主席汇报，来回穿梭。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总理十分紧张，搞了一夜，原定的政治局会议不但没有开，而且都来不及通知不开会。

#### ◇ 河北4人发言反康生

25日下午我到主席那开会时，华北组开会又出了一件事。

刘子厚未到，尤太忠到了。中央委员王国藩、吕玉兰、石家庄的马福全、候补中央委员唐山的樊德玲，这4个人都是从基层来的，大部分是劳动模范。他们不知从哪听来的，说康生反对毛主席，这是会上的小道消息。他们火了，说：“康生是坏人，那和他干，和他干！”吕玉兰十分激动，拍着屁股跳起来。当时大家的思维模式是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

尤太忠觉得这样做不对，赶快和刘子厚讲了。

刘子厚一听急了，马上到我这来，说：怎么办？点名可是件大事，对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便点名。讲事可以，点名可不成。这些年轻人不懂的。

我一听了很恼火，这些年轻人！我和吴德、刘子厚等人开会商议，我出了个主意：要刘子厚做这4个人的工作，等明日开会时，康生的秘书来参加会，让这4个人在会上检查，这样不就把话传给康生了吗？最后我说晚上在总理那开会，我再向总理报告一下。25日晚上

我到总理那，一看别人都未到，吴德已先到，我向总理谈时，总理表示已知道了。他知道还不是吴德报告的。我要向总理讲，是自我批评的口气，吴德讲是告状的口气。

可是到华北会议时，这些统统栽到我的头上。我有 8 条罪状，第一条就是反康生。

◇ 陈、汪检讨

8 月 26 日晚上总理要开政治局会议，定在 9 点开会。八九点钟，陈伯达派秘书找我的秘书，要请我去一下。以后知道，陈先找了解学恭，因为陈在天津蹲过点。解可能有些发觉，借故说要看电影，就没有去。他也可能没有发觉。

我说：不去。秘书认为离开会还有一段时间，陈离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近，劝我去一下吧。

我去了之后，个子高的秘书出来了，他回去通报。我听到陈的秘书在隔壁房间里议论。

陈来了之后请我坐下。秘书要走，陈说：你不要走，坐在这。然后陈对我说：“主席找我谈话，批评我。我负担很重，头很晕。”他也不讲他和主席讲什么了，主席批评他什么了。我没有讲话，等他下文。

陈又说：“我要到华北组作检讨。”

陈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两句话。我借故开会出来。他请我向总理转达：我身体不好，今天不能去了。

我到了总理那里，和总理一讲，总理说：他已经来了电话。

我和陈伯达接触就是这么一点，前前后后半个小时。

又过了一两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他已请示主席，他要来华北组作检讨。他提了一个名单，各小组召集人，等于是各省市负责人。他说河北可以多来一个人，就是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因为我兼着华北组的召集人。我马上向总理报告，总理只问了一下：“主席讲的？”

我答：是他说的。

总理也没有再讲其他的话。

过了几天（大约是 9 月 2 日），汪东兴来了一趟。约到我住的地方，没有让秘书们参加，参加的人有郑维山、河北刘子厚、内蒙尤太忠、天津解学恭、北京吴德、山西的陈永贵。他来了之后，没有检讨，说来说去还是为他自己辩护。小组会又把他攻了一下。大家的意思是：主席讲了话，都明白了，问题很简单，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就完了。开会的时间不长。郑维山发了牢骚，郑、汪两人还顶了几句。

会后我向总理汇报了，没有书面的。因为秘书没有参加，汇报只是口头的。

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值班，没有上山。事发后29日黄永胜上了山，参加了两次会。有一次他在华北小组会上表示：我没有在，我在也要犯错误。后来揭露出来，他的发言是在山下预备的。

#### ◇ 《我的一点意见》

8月29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做了检查。

9月1日大会休息，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说：“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就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9月1日将主席讲话发给我们。

2日开政治局扩大会，晚上开宪法起草委员会，张春桥给我打招呼。3日上午小组会，下午、晚上大会讨论。4日上午大会讨论，晚上主席召集开会。5日上午传达，讨论公报。9月6日大会闭幕，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当天我下山，飞机经安庆回到石家庄。

10日人民日报发表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公报说：“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全会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公报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公报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 毛主席路过河北打招呼

1970年9月9日毛主席下山回京。9月中旬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从郑州给我打电话，说：主席来了，还是庐山上说的话，主席讲你们对陈伯达都不了解。

过了一两天，9月19日主席到了石家庄。我、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河北军区司令马辉（他是一方面军的干部，1955年的少将）、政委曾美、27军军长闫川义、政委马杰（闫川义是打仗的。马杰是好人，他在抗战初期是县以下的区干队的政委）6个人去专列上见主席。马辉等4位军队干部均未参加庐山会议。

主席和汪东兴在专列的办公室。开会时，要给主席开电扇，主席说：不要机械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吧。（意思是自己拿着扇子扇吧）主席的气已消了，讲话心平气和。他讲：陈伯达其人你们不了解。（主席以陈指林）重要的是5个宣传员。主席没有点名，汪东兴警觉性很高，坐不住了，马上为自己辩护。主席说：没有你，你不算。

主席讲：6号简报好凶呀，千刀万剐。流氓语言！造反派语言！你在北京犯了错误，人家也没有把你这样。

我没有讲话，心里比较紧张。五个宣传员，如果汪东兴不算，就可能有我。因为黄永胜是29日上山的。但是我并没有发言，没有宣传什么。汪东兴是挂帅的，陈伯达和他的论点同林彪是完全一样的，似乎完全是商量好的，不知他们怎么搞到一块了，一唱一和。五个宣传员是不是讲错了？

因为过于紧张，忘记请示是否要传达主席的讲话。下车后才想起来，又没有返回去再问，主席已回到卧室车，也不好再问。

主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主席下山后又算打了一个招呼，主要是讲陈伯达其人。听说主席转了一圈，具体到哪些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后来听说有湖北、河南。

主席讲话时我们因为弄不清楚，也不敢记。回来后我和刘子厚商议，我们怕忘记，我主讲，刘子厚补充，尽可能地回忆，把主席讲的主要内容都记下来。我们议定保密，留个底子，只留一份，存在秘书那，严格地保密。

我们不敢传达，因为传达了是祸。庐山会议明确传达的就是两个文件，第一是《我的一点意见》；第二是会议公报，其他都不传达。毛主席讲了五个宣传员，讲了公报，你如果传达了人家一定要问，你讲不讲。那时规定的纪律是很严的。

70年代末我从安徽隔离回到北京，陈锡联告诉我，我被隔离后，总理曾对他说：“雪峰是个好人，就是简报没有送给我看。”

为什么别的组都不出简报？我想这些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华北组的这个简报一出使毛主席了解了情况。

后来王良恩因此而自杀。

□ 原载《世纪》杂志。

~~~~~

# 【见证历史】

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 宋双来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自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在这次全会上，雪峰同志作为华北组的组长、主要召集人，因为签发了华北组8月24日下午大组讨论情况的二号简报，被指责为“抢先”抛出“六号”“反革命简报”。1970年底，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主要因这项罪名，被说成“紧跟陈伯达反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又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大将”，进而被“永远开除党籍”，解往安徽，关押长达九年之久。

我作为九届、十届候补中委，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被编在华北组，经历了各组大讨论，了解讨论发言的情况，目睹了雪峰同志主持讨论的情形。负责任地说，因简报在政治上“诛杀”雪峰，不合事实情理，应当还他以清白。我亲历的事实是：

## ◇ 审慎主持讨论

尽人皆知，这次庐山会议是一次情况复杂、斗争诡秘而又激烈的会议。全会开幕前，雪峰和我们一样是带着轻松的心情到会的。因为会前中央两次告示与会者，会议议程有三项，即讨论修改宪法草案、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其中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是全会的



主要任务。并且说，8月开全会，9月开四届人大，接着过国庆节。我们上山前后，曾三次听到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传达。并且在7月下旬发给我们和省部级党组征求意见的宪法修改草案中，已经没有国家主席一章。在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中，还特别提到，中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因为心里有这个底，我们多数与会者上山时，都是带着既开会，又避暑，舒缓一下那个年代超负荷紧张工作的疲劳。记得雪峰在飞机上问我到过庐山没有，我说没有到过。他说，这次开会不会紧张，庐山很美，景点多，文化遗迹不少，多转转。开幕前，我游览时还曾两次碰到他，可见他的心情也是轻松的。

可是就在8月23日的开幕会上，毛主席宣布开会，周总理按预定安排正式宣布“三议程”后，原本排在会议后期讲讲战备的林彪，突然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接着康生抛开原定的由他对宪法修改草案作说明的话题，大肆吹捧林彪，发表了与会前中央告知与会者的会议任务、主旨大相径庭的讲话。本来新宪法修改草案已没有设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讲：新宪法草案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肯定了毛主席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康生则说：“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的讲话”，“在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的讲话一结束，我们看到已经不耐烦的毛主席立即宣布散会。这样一来，与会者的心头罩上了阴影，大家如堕五里雾。当时虽未料到这场斗争的内情和尖锐性，但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如有的猜测林彪大讲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地位，重提被毛主席划掉的“三个副词”，说什么“除国内国外反动派都不能不承认的”，是否镇一镇所谓的“二月逆流”与会的老帅和副总理；有的猜测否定毛主席地位、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的人是否出在宪法修改小组；说新宪法草案肯定了毛主席“国家元首”这样以前国内从未使用过的提法，是否意味着国家体制要改变；毛主席明明多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康生却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带着这些疑问，8月24日上午讨论休会时，我曾问雪峰，他说：“我也不清楚，独立思考，看看再说。”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24日下午华北组讨论时，陈伯达、汪东兴顺着林彪讲话的调子作了火上浇油的发言后，大部分与会者情绪激昂，把发言集中到了讨伐反对毛主席的人、要求设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上来。因为与会者大都认为这天的讨论，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重大原则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反映讨论情况、情绪和要求的华北二号简报，上送大会秘书处措置。

据我所知，这份简报是中央派驻华北组的秘书和大会指定的华北组各省市、北京军区轮值秘书整理，雪峰和另两位召集人共同签发的。尽管华北组这次讨论“闹得很凶”，雪峰主持这次讨论和以后的各次讨论，只是召集主持，自己始终没有对林彪、康生的讲话以及陈伯达等人的讨论作一句表态。记得当时有一位中委好心地提醒雪峰：“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明确表态好不好？”他笑笑说：“想不清楚啊，怎么表态？”甚至24晚和25日上午的讨论，雪峰还是只主持，个人不作发言。就是说，毛主席所说的林彪、陈伯达一伙闹了“两天半”，雪峰矢志独立思考，慎独发言，审慎地主持了两天半。雪峰同志这种在高层复杂斗争中保持静气，临乱不惊的审慎情形，给我的印象尤深。受他的影响，在那次会议前期，到口的话，我也含而未吐，没做一次表态发言。由此，多年来我怎么也想不通，雪峰同志当时那样的状态，怎么会与林、陈在庐山反党篡权联系在一起？

◇ 雪峰签发的是华北组二号简报

庐山会议前期，即林彪、陈伯达一伙闹事的阶段，华北组总共出两期简报，即一号、二号，这两期简报都是雪峰主签的。一号简报是反映8月23日晚上大家短暂讨论发言的情况，内容有据可查，主要是反映对开幕会的感受。如主席亲自主持开幕，总理、林彪、康生讲了话。主席、林彪身体健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等等。对于林彪、康生不寻常的讲话所引起的震动、不安、猜测、疑问并未涉及。二号简报，主要反映24日下午大家讨论的情况、情绪和要求。当时在讨论结束后，三位秘书就问是否出简报，雪峰和几位副组长交换了一下意见。雪峰说，按中央规定办。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你们整理出来，我们签发。于是秘书立即在会议室抓紧整理。整理完毕，24日晚大组讨论前，一直压在雪峰同志手上没签发。压了约四五小时后，即当晚12时左右，经雪峰和另两位召集人审阅签发，由中办派来的秘书带回去交大会秘书处。这期简报的编号为华北组二号。

8月25日下午，在吴德同志主持下，大家讨论了一会儿，雪峰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决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责令陈伯达等人做检讨。接着宣布休会，听候中央安排。之后不久收回了六号简报。得知毛主席批评雪峰出简报“没把关”“你这组长怎么当的？”随后因此怀疑李雪峰参与了林、陈的反党阴谋。传出毛主席批评李“抢先”出简报是因为六号简报发在了四号、五号之前。

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批评，先是一惊，随后疑惑不解。先讲“抢先”问题。我想，雪峰签发的是二号简报，怎么又弄出“六号”简报？经问秘书才弄清原委，按照中央规定和职权范围，华北简报送大会秘书处后，由中央统一编号，统一印刷，统一分发。华北二号简报，中央编为六号，这就不关雪峰和华北组的事了。因为怎样编号、如何印刷、何时发出，与雪峰毫无干系，编号、印制、发出时间先后，雪峰也管不了。因此说雪峰“抢先”出简报是主观臆断。为准确起见，当时我的这种看法、想法形成后，曾问过与会知情人和雪峰的秘书。他们都说我说的是实情，雪峰主签二号简报后，再无过问简报印发的事。

再说简报的内容。负责任地说，这份简报如实反映了大家讨论的情形，后来被说成为“反革命简报”。它是否为“反革命简报”？我认为，林彪、陈伯达这一伙在全会开始时，就大使阴谋，毛主席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看到这份火药味十足、煽动“揪人”、要求设国家主席、与大会初衷和会议议程大相径庭的“简报”，他生疑、生气、发火、收回，使用尖锐的言辞予以批评、讨伐，似有可体凉的一面。问题的实质在于雪峰签发的这份简报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大家讨论发言的情况。主席批评后，我和几个同志曾对照简报内容，核对大家当时词论时的发言，完全负责任地说，简报真实无误地集中反映了大家发言的实情、情绪，要求，连所载尖刻语言都是发言者的原话。每一个观点、建议、要求和呼声，都能从发言者的发言中“对号入座”。因为雪峰只主持、未发言，简报上没有他的话。雪峰要求简报如实反映讨论情况是不应当受到责难的。反过来说，简报假如离开大家讨论的实情另搞一套则是不可思议的，是为党性、原则、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离开实事求是，还有什么是非曲直，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因此，我认为雪峰同志按实事求是处理这份简报是无辜的。

#### ◇ 华北组下午的讨论什么会“闹”起来

就我当时的感受、认识，加上后来看到的有关材料，思想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华北组讨论时闹起来的因由，除了林彪、康生开幕时讲话的诱导外，发言表态的同志，主要是听信了陈伯达、汪东兴这两位具有特殊地位、身份的人煽动蛊惑起来的。那天下午讨论时，陈毅、钱学森先讲，接着河北的中央委员马福全同志发言。马未讲完，陈伯达、汪东兴来了。他们刚落座，陈伯达就迫不及待要发言。因为马已经讲的时间不短，雪峰让马讲简洁些，马很快结束了发言。陈伯达即兴讲话。他的闽南话我们大都听不懂，有些话是雪峰、汪东兴翻译

的。记得他讲的主要意思是，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煽动把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妄图否定毛主席领导地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揪出来。汪东兴接着陈伯达发言，汪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加之他语言清晰，声音高亢，与会者格外注意听。汪东兴讲的主要观点和所起的作用，《吴德访谈录》中有准确的记述。最引人注目的话：“有人利用不设国家主席，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一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多亏我们林副主席发觉得早，不然问题可就大了”。讲到这里，陈伯达立即站起来，连手带脚比划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欢喜得跳起来。”陈插话后汪继续说，“有的人天真地想，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减少主席的外事活动，我就在主席身边，我完全清楚，哪次外事活动少了主席？主要外宾不见到主席就不肯走”；“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我非常清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发言最后，他特别激动地说：“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对于陈、汪，特别是汪的发言，原来疑惑猜测、莫衷一是的与会者，信以为真，以为摸到了底，情绪一下激愤起来，以致出现了抢先发言的情形。此后的发言更集中到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和揪出反毛主席的人上来。记得汪发言一落音，一位要去开三北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同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就这样，在陈、汪发言的蛊惑下，华北组讨论会像开了锅的水，闹得一片沸腾。确定无误地说，闹成这样，最直接的因由是陈伯达、特别是汪东兴的发言引起的。与会者之所以受到汪东兴同志发言的影响，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会前于三月下旬听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与七月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意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派汪东兴同志回京向政治局转达的。所以他违背常情的发言，人们自然特别看重。

前面已经讲过，全部华北组的讨论，雪峰同志都是审慎地主持讨论，既不引导大家发言，个人也未作发言，由与会者放手按自己对会议精神的领会、意愿去发言，即使在陈、汪作了如此明确、激昂的发言，他也始终处于静思、慎言中。当时他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紧跟林彪、陈伯达反党呢？

我在《吴德访谈录》中，看到这样一段话，8月25日下午，因雪峰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由他主持华北组讨论，河北的四位年轻中委、候补中委讨论发言。口径一致建议、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由此吴德同志怀疑雪峰同志事先给他们打了招呼，统一了口径。当时的讨论，我在场。发言的不止是河北四人，还有北京、天津和山西的同志，口径也是设国家主席、揪人。究其原因，这个口径于24日下午已由陈伯达和汪东兴同志统一起来。因为我所在部队抗美援朝回国后就驻在河北，与河北发言的四位同志都很熟悉。一次在石家庄市开会，见到他们中的两位闲聊时提起那次会议发言，两人都说是听信了汪东兴的发言。我想吴德同志的怀疑可能是推测出来的。

□ 来源：《论文网》

~~~~~

【往事非烟】

漫长的告别

• 郝新平 •

## ◇ 题记

这辈子，也许终此一生，我都在以写作的方式、激扬文字的姿态来怀念您感恩您！

得知周学敏老师离世消息应该是在我上山下乡之后，是自杀！

最近，看了周老师小女儿刘大红那血泪斑斑、不忍卒读的文字，方了解到细节。一位五个孩子的慈祥且心思极为细腻缜密的母亲，在服大量安眠药被家人发现送医抢救过来的两周后，再次走上不归路。是什么推动老师如此决绝地慨然赴死？！当一个人在黑暗中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万念俱灰到极致——以为相濡以沫的丈夫（时任北京23中校长、党委书记）再也回不来了、校园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形势日益严峻、半生的心血“周学敏教学法”被批为大毒草……便没了再活下去的勇气，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小女儿回忆母亲最后日日夜夜的细节一再在我脑海中闪回。我常常设想，在1968年那个夏末的夜晚，老师是在怎样的煎熬折磨中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刻？即便是没有如此体验的人也会想到：那必是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的泣泪死别！老师本就那么瘦小羸弱，小女儿说去世后的遗体已然是皮包骨，她一个70斤的小孩都能轻易抱起来！每读至此、念及此，我都不禁潸然泪下！

“有天中午，校园里人很少，我看见周老师站在我们班《‘周学敏教学法’是修正主义大毒草》的那张大字报前，周围没有别人，于是过去了。周老师扭头看着我，还是满脸的微笑，意思好像在说：我看看你们都写了些什么，没关系的。周老师看大字报，我就跟着老师走，大字报是长长的这么一溜，周老师看完了以后，又扭头看了看我，还是满脸的微笑，那个神情与平常一模一样，好像在说，文化大革命你们批判我什么，我来看看你们是怎么写的，但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责怪你们。让我没想到的是，那次看大字报竟是我与周老师的最后一面。一天，早晨上学时，王燕磊告诉我周老师突然离世的消息，当时我不敢有任何表现。放学后别人都走了，我就又到老师家去了。那小院的门开着，院子里特别安静，在北屋的门口有几个人，其中有周老师的小女儿刘大红，别的人不认识。他们围在一起说着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见，满脑子里嗡嗡的全是周老师。我不敢说一句话，出来以后才敢让眼泪流下来。回到家我放声大哭，也不敢跟任何人说我去周老师家了。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从来没有亲人走过，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滋味，我跟周老师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真觉得是一个亲人走了。”我们班当年的语文课代表何锡英含泪回忆道。她说，“我们一直感到十分愧疚，现在我们应该把周老师和‘周学敏教学法’原原本本地介绍出来，让人们永远记住曾有这么一位老师那么努力地探索中学语文教改，而且成绩斐然，也应该让它在现在的语文教学中发扬光大！”

是的，何锡英说出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心声！多少年来我们都好想向周老师表达感恩和愧疚，却苦于没有一个机会！2017年1月11日，我们原师大女附中中四（1）班部分同学在周老师儿女家畅谈老师及其教学法带给我们一生的教益。这是积累并持续了50年的一场——

《漫长的告别——来自“周学敏教学法”最大受益者的追忆》

周老师，我们从您的教学法中受益匪浅！50年了，一直是这样，您听到了吗！站在周学敏老师的遗像前，我们最想说的就是这句埋藏于心多年的话。

曾经有缘相逢您的年代，似近犹远，似远犹近——

1963年中二开学时，您担任我们的语文课兼班主任，您的模样便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身穿一件蓝色大襟上衣，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耳后，微笑永远挂在嘴角，两个深深的酒窝笑起来真好看，会说话的双眼总是流露着母亲般慈爱的目光。您个子不高身子单薄，上课时说话声音不大却柔柔的。上课伊始，您让我们用打擂台的形式，说出自己新学期的新打算。讲台旁边放一面鼓，由两个同学边击鼓边引导同学上台，从不发怵讲话的同学争先恐后，而原来不爱说话的也上台发了言。您第一次组织的活动便拉近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课间您总会在教室里跟我们聊家常，平易近人。同学上您家去，不是能吃上糖果就是把枣树上的枣塞满书包让带给其他同学们吃。夏天去，有冰水喝，您还会拿着大蒲扇给同学扇，就跟亲人似的。

从不记得您什么时候训斥过人，始终都是充满爱心、诲人不倦。您的课没人捣乱，我们也不想捣乱，都觉得跟享受似的。您不是靠那种所谓的师道尊严把我们震住，而是靠您的魅力，让人不得不服。

后来也从事教育工作的几位同学说，在您的行动教导下，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效仿您，要想把学生教好，能进到他们心里去，一定要有情感的沟通，你不爱他根本就教不好他。

#### ◇ 您让我们对作文课感兴趣

作文是多数同学最怵头的，每天从学校门到家门就这点事，有什么可写？您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提出要不怵写，当你们特别细致地去观察生活，就能够抓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描述发挥。您出的作文题不是要围绕一个题目写，特别的广泛，比如说写某某的联想，就让同学们展开思想的翅膀去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我们可有的写了，作文内容有血有肉，十分生动。记得学完《白杨礼赞》，就让同学们写《××赞》，写喜欢的东西，写各种礼赞，人物也行，事物也行，大家都不愿意跟别人雷同，你写了这个我就会写别的。同学们思路大开，百花齐放。您的作文批改很有重点，写得好的句子用圆圈相连的线画出，写得不好的句子用波浪曲线画出，自己找出毛病在文章后面重写，比较后就有提高。何锡英同学写了一篇《红的联想》，先写爸爸点燃了一支烟，那个烟头怎么红，然后就想到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点的篝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后写到1949年成立新中国，但渣滓洞的人还在绣红旗，然后我们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您说挺好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就这么练笔。下午她又写一个《绿的联想》，树叶在白杨树上怎么点点的绿，想到边疆哨卡风雨中的绿军装，就这样联想着写。对学生鼓励式的教学，绝对是您作文教学成功的地方。您坚持让语文成绩很一般的何锡英当语文课代表，她两年中和您接触的特别多，特别愿意去您家。每当有作文课那天，她收齐作文本，放学后送到您家去，每次去都能享受特殊待遇，“老师会马上把我的作文拿出来当面批改，不管你是写的好与赖，永远都是满面笑容，真就像妈妈对女儿那样，这点儿怎么样，那点儿怎么样，一听就能听到心里了，我的作文成绩提高很快，原来作文成绩没得过什么高分，自打周老师接班后，经常得90多分，而且有时还给搁到后墙上当范文。”王燕芝同学写过一篇作文，听见邻居在外边吵架，然后联想到这个邻居的形象。当时正好邵荃麟主张写中间人物，说英雄人物和坏人都是少的，不好不坏这样的中间人物是多的，像枣核中间大两头小。您说这就是在写平民百姓的生活，写得特别好，美丽的词句不是你挖空心思去想的，能言简意赅地表达就挺好啊，感受到了什么就写什么，别无病呻吟！受到鼓励让同学们自信心大增，写作文感觉从来没有的轻松，对作文课特别感兴趣，不但不发愁还特别爱写、想写。您会鼓励我们说很好，再写呀。何锡英每学期末的作文都是厚厚的一沓，因为别人写一篇，她写两篇。她后悔自己太不懂事了，给您增加了多少工作量！我们作文量绝对比别的学校多，一学期不止有20篇。何锡英把作文送给在外校当语文老师的舅舅看，舅舅说这工作量太大了，周老师怎么能批改这么多作文啊！

您的每节作文课都要解决学生的一个难点，除了上面选材问题外，还有开头结尾问题、分段问题、逻辑问题、修辞问题等等。那时，我们还写过童话和电影故事呢。到了高中，您教我们写议论文和说明文，这两种文体比记叙文更难驾驭，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更直接。

#### ◇ 您的作文点评精彩极了

同学们表示都特别喜欢上您的范文讲解课，您不但把每个学生作文经典的地方摘出来分析，而且还朗诵，情感非常自然流露出来，太生动了，印象就特别深。也许，一篇整体不是很好的作文，但您总能发现其中闪光的地方，哪怕在一点上可能有个新意：你可能细节描写的好、她可能形容词用得好、而另一个可能用了诗词，甚至卷面干净字迹整洁，您都会一一给予表扬；还有就是对每个人只进行纵向对比，只要比前面作文写得有进步的地方，都给予表扬加分。这种激励的作用是很大的，让人备受鼓舞，就会一篇写得比一篇好。

记得当时胡依年一篇作文的题目是《外婆手中的一盆水》，您讲评时先说这是外婆手中的一盆水，一个红萝卜在里边拖起了涟漪，然后又把这盆水浇到花上，说花喝足了水挺起来了。您讲课的那个样子现在都记得，就让你觉得这是那么生动，好像萝卜在水里边一转，水就变成了红颜色的，拖起了涟漪。讲一盆水，就是教给你观察细致，描写细致，这篇作文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在点评中对孩子的启发，那是最好的了，既写了孩子的动作、心理，还有外婆的动作和语言。一次作文题目《一个……人》，我写的是弟弟，标题是《一个五分钟热度的人》。您在课堂点评时说写得很好，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细节来表现这个人物，人物特点马上出来了，紧扣标题。那篇作文给的分也特别高。有次写论述文，当时正好是中苏关系交恶，报刊上发表过九评。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依现在的眼光看，这篇作文写的挺肤浅的，里面我用了一个词叫“鲸吞”，您大加赞赏，用红笔圈了，说这个词特别的形象。本来对论说文特别畏惧的我，一下子觉得特受鼓舞。这两篇作文都被张贴在学校教学楼大厅学生作业展柜了。

#### ◇ 您让我们背诵课文不再是难事

刘大明记得，当年在别的学校上高中的时候，背课文也就是三四段或者是三四篇，再一看妈妈文章里写的让学生背十几篇、二十几篇，文言文几乎都背，还有好多一般的文章也背。到现在他也挺奇怪，用什么时间来背呢？同学们记得，上语文课是最轻松的，您虽然要求文言文全文都要会背诵，现代文精彩部分也要会背，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负担。因为您不但讲课生动，语言诙谐幽默，而且记忆力极好，要求同学背诵的课文您都能背下来。其他课一般上课先发小纸条测验，然后要判分，负担特别重。但是语文课不那样，背不下去您也不会为难大家，绝对不会说你怎么没记住啊，而是说这么好的课文你们一定要全文背诵。一篇新课文，您先边朗诵或背诵边讲解，然后合上书，让同学复述，尽可能地用课文中的词语，就像是用线串起来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再对照课文记；让我们接力背，大家个个不甘落后，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如果你只记住了一部分也可以站起背，比如《岳阳楼记》是要全文背诵的，讲完课文后，先是大家集体朗诵，朗诵完了以后就说谁能背就举手。举手站起来可能背一段，背着背着不会了，一吐舌头，您说：“坐下，谁还能背？”接着又一个学生背，别人背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看书。您从不与学生为敌。所以大家在课堂上基本就背得差不多了，那会儿好多古文诗词都是这么在不知不觉中记住的。学习文言文时，您总是让我们先预习，看注解查字典，课上先由学生讲，您再讲解难点要点部分，这样就提高了我们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您还补充文言文的阅读资料，发大量选自中华活页文选的古文，几乎每周都发，我们背诵的不光是书本上的，还有这里面的。增加了文言文的阅读量我们不觉得重，为什么能10分钟背下来，因为您把我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谁都不想让着谁。

您还让同学在大黑板的旁边写上古诗，几天换一首，让您在不知不觉中记住。比如说你上代数课一走神，看见小黑板上写的“铁马秋风大散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好多东西，而且一直都不会忘。文学修养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了，真是终身受益呀。以后，在面对良辰美景的时，就自然而然想起了这些诗句，看到河塘的荷叶刚出来时卷成一个小卷，马上就会想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真是美不胜收。

大家还都记得您朗诵好，声音好，语调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您也要求我们要带着感情朗诵。有一次张祖和念课文，您特别兴奋地说：“哎呀！念得太好了！这个声音真好啊，就像敲钟一样！”您当时的样子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语文课那个生动呀，让人一点不觉得这是上课。

让我们会背的您都会背，私下谈话也是张口就来，在教研组您老是在那儿看书。您给我们的文学沉淀，比我们的父母和其他老师都多，这是我们一辈子都感谢先生的。

#### ◇ 您顶着巨大压力进行教改

一门功课，尤其是语文课，能让全班40多同学无一人不爱，这是一种什么魔力使然？！

毋庸置疑，“周学敏教学法”是一种创造性的教学法。作为学医出身的您，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中国从小学开始教育就是满堂灌。您在一篇文章说，从1960年开始，下决心再也不能满堂灌了，那时起您就开始琢磨这件事，在教学上进行大胆开创，形成您独特的教学法，而且是把学生当作教学法的参与者、研究者、探索者共同进行，取得明显效果。一直到1964年，您才在杂志、报刊上发表出来，其中写到的那些非常灵活的教学方法，现在的老师也不见得能赶得上。

您一是在语文课堂上教学的创造，另一个是在作文教学上的创造，这两项创造都打破了当时语文教学甚至整个初中教学的局面。如何给学生以最大的鼓励，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把她们的潜能挖掘出来这挺不容易的，这是门艺术，您真的能够突破那个框框。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勇气去突破，去进行这么大的教学改革。可能大家都会说努力把课教好，但是能够做到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来进行教学改革特别的不容易。

我们那时听到一些说法，说“周学敏教学法”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外校说这个教学法太神奇了，要学周老师；校内的一些语文教师并不认可。“周学敏教学法”的创立，是跟胡志涛校长的全力支持非常有关，没有胡校长的支持，不可能有周学敏教学法，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推广。您对教材和课时的处理，跟别人不一样。当时每周7节语文课，您能安排3节为作文课，4节课来讲课文。在讲课文时，还有背诵、朗诵，还要写一些短文，像通知、便条之类的，这其实也属于写作。等于作文、讲课文，课时各占一半。这在过去语文教学里是绝无仅有的。这要是没有胡志涛校长给予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您还把课文都打乱了，进度跟人家不一样：是按对课文教学或对作文教学有利的编成单元，而且这个单元的课文有时候串着讲，可以对比。比如说这一语文修辞方法跟那个类似，等等。是胡志涛校长的大力支持，您顶着压力在创新。

江西师范大学有一个教授叫余应源，1964年，慕名来听您的课，之后就喜欢上了“周学敏教学法”。原来他是中学老师，后来成了大学老师，专门研究中学的教学教法。他从2001年相继写文章一直写到2009年，现在退休了还在宣传评价、呼喊，说要想教好语文就得向“周学敏教学法”看齐。他总结道：周学敏老师把她教学分成课文教学、作文

教学两部分，课文教学中的一部分还是为了支持作文教学。她的作文教学比较立新，她把学生作文中的毛病一一列出来，再根据这些毛病归纳成五项，每学期只要一接新班就根据这五项一项一项地解决。比如说，这学期安排学生18个作文，那么就有15次作文是来解决我这五项问题的，每三次解决一项。这种教学办法是过去没有的。叶圣陶先生说为什么语文教学效率差，赶不上数学和物理教学呢？语文到底学成什么就算往前走一步，应该把学生教到什么水平算合格，这个都没有标准，到现在也没有。他说应该突出语文的所谓工具性，就是应用性。周学敏老师在作文教学上对叶先生的这点进行了实践，把学生的问题一个一个都摆出来了，一个一个地攻克，那么这样的学生作文，原来开头结尾不会，那我先让她会开头结尾，选材不会慢慢让她会选材，组织材料不会我慢慢让她学会怎么组织材料，怎么删减，哪个材料比较重要，哪个材料比较次要。创新还表现在，一是课堂上原来没有的形式加进去了；再就是在作文教学上进行了创新，突出了它的工具性，怎么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课堂上她更重视学生的人文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以及语文知识方面的欣赏性，在这两方面几乎是齐动手，所以能做出成绩。

毫不夸张地说，“周学敏教学法”是新中国教育史尤其是语文教学史上重要的一笔，是一次极具特色的教学改革，至今对中国中学教学都有指导意义！

#### ◇ “周学敏教学法”让我们受益一生

开始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教学法，是后来有人听课才知道的。先是胡校长一个人来听我们的语文课和作文讲评课，接着是六七个、十来个老师来听，再往后是几十个老师来听课，我们班根本坐不下了，于是就到阶梯教室去上课。经胡志涛校长推荐，还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办了个展览，北京市教育局在政协礼堂组织了一堂公开课。在政协礼堂上公开课，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班里多位同学表示，当年自己语文成绩在班里并不突出，但是出了校门后，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有的在考大学的几千人中，语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只有十五六人时，自己就在其中；有的工作中写总结、调查报告等等总是最快最好的。这都得得益于您语文课给我们打下的好基础，在日后的学习工作中运用得心应手。从事理工科工作的同学说，语文是构成文化的一个基础。人们对数学、物理的理解是通过文字去学懂的，语文基础好理解力强，理工科也照样学得好。

我在新闻学院学习的科目是以新闻学专业为主，至于写作的功夫绝对都是中学时期打下的底子，完全是“周学敏教学法”给予的方法和思维沉淀。那时候我在班上作文是不错，基本上每次您都要点评。我的文章特点就是散文化一直到今天。这是您教学法使我受益最大地方。您特别推荐一位散文非常出色的作家刘真，经常在课堂上念她的散文。我曾认为要是散文化的话，会说很多排比句、叠句，这样会不会使文章很罗嗦？但是您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刘真有一篇叫《长长的流水》的文章，写流水，您带着很丰富的表情动作念“流啊流啊流”。你们听了是觉得很罗嗦吗？不是的。把这种场景完全溶解在文字中，画面化了，这是抒情，是最能打动人的写法。多年后我看到钱钟书先生造了一个词叫“通感”，马上就联系到这就是周老师！真是不谋而合。什么叫通感？通过语言把声音表现出来，读者仿佛听到水哗哗流的声音了，这就是一个通感。听觉、视觉和触觉，以语言文字让你感受到。此后，我一直在作文上力图按照您教导的这个方向去做。我最后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每次写的东西不管是消息，通讯或者是言论，总有所突破，受到同仁和读者的赞赏喜爱。您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打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要有情感。每当我饱含激情去创作时，一定是最出好作品的时候。我深知要让文章一下抓住读者眼球还必须在遣辞造句方面下功夫，像您教我们的把握细节、情境的描写，开头结尾的呼应等等。我将此也运用到标题导语上，首先吸引读者的



目光关注这条新闻，才能读下去。我在导语中就有细节，就有场景的描写并且力图散文化，内文更是如此。这些做法和西方新闻学提倡的散文化写法不谋而合，很抓人。作品在全国的各种新闻评选获奖，大概有几十次。当然我那时候也爱看书，博览群书有积累，但是没有您的点拨和指导，这些根本不可能完全溶入自己的血液中被我所用。您是给了我一辈子的影响，我时时不敢忘怀！

都说语文老师是塑型的，和数理化老师提高思维能力不同，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很大部分是受语文老师的影响。

您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知语文的魅力，文学的魅力，脑子里总有美的东西存在，总有诗情画意。这些融进骨子里的东西，反过来培养训练了我们观察世界、独立思考、处理事物的能力，培养我们的人文素养，甚至做人的方法，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自强不息。何锡英在山西插队时，生活很艰苦，常挖水渠。她把“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写在渠壁上，再念出声来，心里怀着一线希望，也许我们还有乘风破浪的那一天。面对黄河有一段平静如镜的河道，她忍不住喊出，哎呀，梳妆台啊梳妆台，黄河女儿梳妆来！那是自然而然联想起来的，是困苦中一种昂扬向上的心态。这就是文学的积淀对人生的影响！您是在教给我们一把学人文科学的钥匙，帮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沉不仅重，感而且伤

同学顾善正的一段讲述非常动情感人：

“1968年已经开始上山下乡，同学天南海北地都走了。一天，教室里没有几个人，这是周老师跟我最后一次交谈，隔着张课桌我俩面对面聊起了当前的形势。她问我：‘开始上山下乡了，你报名了吗？’我说没有。她说：‘我觉得你还是走吧。’我说想等一等，我觉得上了女附中高中，目的就是上大学，所以还想等。她说：‘不可能招生了。我劝你可以现在报名，因为现在去的是兵团，兵团是有工资的。你要等，我觉得没什么结果。我的大儿子是清华的，学的是科技，连他们都到农村去了。所以，你还是现在走吧。听说下边就要去农村了，农村条件自然没有这个好。’在那种人人自危形势下，周老师还能跟我说出这种话，给我出主意，周老师怎么这么关心我啊，只有母亲才会这样。我每次想到这次谈话心里就非常激动。我永远忘不了周老师。”

请注意一个时间点——1968年的夏天，那正是您最艰难的日子！在这次面对面的对话发生不久，您便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与顾善正同学恳谈是您与您学生的诀别？在您生命最后的时刻还在惦念自己学生的前途，您是怀揣无限眷恋去往另一个世界的！

可我们又在哪里？！当往事已然成为往事，留在心头的是永远的痛！

今天，您的学生，我们已迈入老年，虽然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但都在安享退休生活，而您却早已不在了。“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一首歌中唱的，可能言中我们的心境——那是有您的艳阳天，我们青涩的身影都曾被您庇护，定格在藤蔓缠绕的校园红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阴阳之间横亘的50多年时光，堪与不堪，都难以再回首，却最是那低头间的泪流满面！

由师大女附中中四（1）班出发的我们，您给予的文化熏染，已构成我们生命中最激荡的青春时光。谁说青春只是人生的一段时期？青春其实是心灵的一种状况，值得恣意挥洒一生！

记忆是宝贵的，而良知更价值连城！在半个世纪告别您的漫长路上，不遗忘间坚挺着去做那些我们该做的，邈邈间传来千年古人范仲淹的喟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来源：《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征文》

~~~~~

## 【亡灵祭坛】

北大子弟沈因立的决绝选择

• 周 锤 •

（原标题：往事的回忆与思考——“不以成败论英雄”）

沈因立的父亲是北大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名教授。沈因立在山西插队多年，对前途极度绝望后，他选择极其独特的方式自杀：将电线连接身体，中间连接闹钟做开启装置，然后吃安眠药，在睡梦中被电击身亡。沈因立的自杀当年震惊了北大子弟，40多年后依然令人难以释怀……

似水流年，人生几何，不经意间，已到了“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年龄，有时内心总难免有世事沧桑，人生迟暮的苍凉。

回想起当年在北大附中的读书岁月——“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风雨雨——老三届上山下乡插队的艰苦生活，直到今天各自的人生之路。同窗学友们的风云际会直至风流云散；各自的生死沉浮直至曲终人阑。无论是铁马金戈的豪情，还是春雨落花的忧思，终如雪泥鸿爪，渐行渐远，被历史的足迹所覆盖。

如今写下这篇小文，希望它不要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常常想起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写它，正是为了忘却而纪念，希望我们的经历不要再有人重演。

我在这里写下插队生活中最深刻记忆的一位人和事。

初识沈因立，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沈因立，北大附中初二（4）班的学生，如果活到现在，当是五十几不到六十的年纪。作为男士，作为专家学者，正是收获丰硕成果的年富力强之时。

每当思及至此，内心总感深深的痛惜。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很多，但他在我心中一直留有清晰、深刻和良好的印象，甚至对他有一份如姐姐对弟弟般的感情。

记得是在插队的那几年中，因我父母是海外归侨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特嫌”罪名双双被捕入狱。那时弟弟只有11岁，也随我与哥哥一起下乡插队。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之传染，弟弟患了肝炎，病得很重，只好由我带他回京治疗，由哥哥在农村劳动挣点工分艰难维持生活、治疗费用。

在照顾生病弟弟的那些日子里，我读了很多当时知青之间流传甚广的书籍，因与沈因立同是北大子弟，又同是北大附小、附中的校友，很自然就熟悉起来，互相之间也交换、传抄了不少书籍。

我想是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沈因立很有教养，总是谈吐有致，进退有据，如君子，如绅士。这在崇尚“革命”“暴力”“造反有理”的年代里，那样的年轻人是很少见的。

每次来我与弟弟的住处（当时是不足七平米的一间小屋），都是轻轻地有礼貌地叩门，不像有的人干脆就破门而入。开门后见他总是温良、谦和、有些局促地微笑着在门口驻足，待我热情请他进来，他才入室。

正如鲁迅先生描写柔石：他有一双孩子般的“无邪的双眸”，一看就知他是个内心纯洁的人。他对各种问题都很有自己的见解、看法，总能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谈得最多的，就是他对钻研学业的体会。

他那时利用插队回京的间隙时间，准备系统地攻读完初中、高中的全部文化知识课程。他制定了完整的学习计划，按部就班地每天给自己上课，很正规地完成着被迫中断的学业。

他希望自己的文化修养、文明教养——如父辈（他父亲是留学美国归国的北大心理学教授）；他还挤出时间练习花样滑冰，而且滑得很好，他学了许多有一定难度的技巧动作；他注意培养自己对西方古典交响音乐的鉴赏水平；他还在学习乐器……

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是个一心向上的谦谦学子。他本可以把自己打造得十分完美和优秀，为祖国做出许多贡献。使我为之感动和常常怀念的，还有他的心地非常善良。

那时我与弟弟因已无北京户口，在京治病期间一直没有粮票，无粮票就常常面临断炊的危险。沈因立本身处境也很困难，父亲在文革中自杀身亡，他又已经插队，哪来多余的粮票？

我从未向他提到缺粮票的困难，但在交往中他多次不声不响地从口袋中掏出数目不小的一叠粮票，放在我的桌上。可能因是“天涯沦落人”，他感觉我们会有同样的困难吧。

我欣赏、赞赏沈因立。他高贵、文雅、一尘不染；他勤奋好学；他善良、纯真——这也正是他崇尚、追求的价值观。而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主流价值观却成为“读书无用”，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为青年楷模；粗鲁、野蛮，连女生说话都带脏字成为流行时尚；同情弱者的善良、爱心本是高尚品质，却成为“没有阶级观念”的代名词被践踏、唾弃。

承袭了种种传统美德、传统文明教养的沈因立，在那种社会大环境中自然就成为另类，而他那些秉性又是根本的、骨子里的，自然与那个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无法融合。也正是这点，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

过了不久，沈因立返回插队的山西农村，又过了不知多久，我从熟人处听到了他在插队的地点触电自杀身亡的噩耗。自杀前他还把可能触电的地方一一注明，谨防他人会受到伤害——他的心地是多么纯良啊！

初闻此讯，我惊呆了，内心的痛楚难以言表。他是如此钟爱人生；眷恋学业；顾及自己喜爱的姑娘；他还在期冀着拥有希望的未来，却在花季的年龄，悄悄陨落。

为悼念他，我曾写过一首悲恸的长诗。这长诗后来在乡下的灶间，当作是他的灵前我祭拜焚化了。

对他的死，我有着深深的追悔。在他死前不久，我在插队的农村曾接到过他的一封来信。信写得很平静，以致我丝毫没有察觉他的精神危机。

信中写到，插队的同伴都已各奔前程，只剩下他一人，他不知该何去何从，该如何生活。他又不能回到北京，因为他妹妹在北京养病，母亲处境也不好，家境十分困难。

现在想来，他是否在向我请求帮助？如果我当时向他伸出援手，想尽办法，帮他转到我们插队的地方，大家对他也会有个照应。同时有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内心感受的朋友，他一定会渡过生活和精神的难关。

而接他此信时，我自己也已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实在是自顾不暇。时至今日，天人永隔，追悔莫及，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曾有人说，沈因立软弱：那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都过来了，他为什么活不下去呢？

我想，谁都不应苛责他。是的，他的精神过于贵族化，他是精神贵族，他有精神上的洁癖。他不会害怕体力的劳累，物质生活的贫苦，但他恐惧愚昧、落后、没有文化的恶劣精神环境。

他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有些学究气，有些古板，有些迂。他只喜读书，也只会读书。出了象牙塔，他会茫然失措，他不知如何应对这个复杂的社会，错综纷纭的人际关系。

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厚的精神内涵，优秀的文明教养。他与终日辛勤劳作尚不足温饱而毫无精神文明生活的世界实在没有结合点，切入点，对那些他实在无法认同和归属，因为这两个环境落差太大。

每个人都有他的软肋，都有他致命的缺陷，这往往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理承受力的底线，千万不要挑战这个底线的阈值。沈因立恐惧没有文明气息的生活，恐惧孤独地承受这种生活，这些在他底线的阈值以下，他倒下了。

但是我想，沈因立仍然是只鹰，“鹰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他虽然在荒僻、落后的农村倒下，但如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是“哈佛”的优秀学子，会作出骄人的成绩，绝非一般人所能及。

当一个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平静地选择死亡，也未必不是坚强。我想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特莱》那段著名的独白：“活着，还是死去？”我想，沈因立在临走之前大概也是这样严肃地拷问过生命，而他不愿乞求于人，他不愿苟活，他宁愿保持自尊地死去，这体现了一个人的勇敢和尊严。

正如古人项羽，在四面楚歌时，他慨然乌江自刎，从而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名句。刘邦虽然登上了成功的顶峰，在人格上却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项羽虽然惨败而死，但他却是“失败的英雄”。

我想，古人云：“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有哲理。沈因立在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虽然失败了，但他在人格上，在精神上是卓越的，他虽死犹荣。

而我们活过来了，如今已走过了大半的人生旅程。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几十年生活中，诸多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加之种种的心理创痛，也曾有着被边缘化的另类人生。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我始终告诫自己：要精神不垮。

每一次磨难，要使它成为新生的洗礼，如“凤凰涅”，是生命在此中得到升华。毕竟，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罗曼·罗兰在《三巨人传》中，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已深植我心中。

尤使我感悟的是美国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名篇《老人与海》，它用寓言式的故事向世人揭示了一条重大的人生哲理。它所描写的老人圣迭亚哥，在与所钓到的巨大马林鱼和追赶的鲨鱼的连续数日的搏斗中，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最后他只拖回了一只巨大的惊人的鱼骨架，但他在精神上始终是勇士，是强者，他是失败了，但他仍是英雄。

生活中，即便失败、失意，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努力、拼搏的我们都尽力去拼搏了，我们就大可宽慰，就问心无愧，因为我们是生活中的强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英雄，虽败犹荣。

诚如古语：“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自强不息，创造期待着一个“桑榆重晚晴，为霞尚满天”的人生晚年。

□ 原载北大附中同学微信群

~~~~~

# 【痛定思痛】

在“纪念邓拓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

• 杜导正 •

我先说几个故事：

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

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

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

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

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

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还算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

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

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个“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

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现在就为了保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 来源：新浪博客

~~~~~  
【前车之鉴】

人性还是党性？文革大屠杀反思

• 赵越胜 •

问：今天这个题目有点沉重，它让我们回想起文革中的死难同胞。但是为了深入反思，我们不得不揭开伤疤。

答：说得对，我们不得不，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你做与不做，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选择，中国人爱讲“皇天在上”，康德讲头顶星空与心中道德，都说的是“绝对律令”。尤其是前几天，大陆河南省有位法院院长声称，如果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应该“只论党性，不论人性”。中国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宝贝王外长，在记者问起中国人权问题时，一副泼皮牛二的嘴脸，更让我们痛感文革不死啊！

问：说起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兴县八三一大屠杀，因为那是红八月最后一天，也是毛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号召“要武嘛”之后在首善之区发生的大屠杀。

答：对，当时我们都在北京，听人纷纷传，说大兴县有地富造反，所以镇压了不少人，当时真没觉得是个事。文革结束后，我才看到调查材料，真让人毛骨悚然。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共杀害无辜平民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是仅三十八天的婴儿。二十二个家庭满门灭绝。调查报告中有个细节，目击者供述，有祖孙两人被活埋，当凶手往坑里填土时，三岁的小孙子喊“奶奶，迷眼”，奶奶说“忍忍吧，一会儿就不迷了”。真没有语言能定性这种残忍。中国人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来不对，能够干这种暴行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肉长的，或者我们只能说他是没有心肝的。斯大林爱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领导屠杀的公社党委书记高福清一定是这种特殊材料。



问：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说的是个普遍的人性问题。在人性尚存时，会自动反抗残忍。为什么文革中的杀人者不是这种情况呢？

答：要动手杀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动机，或劫财，或劫色，或复仇，或收费。但文革中的屠杀行为往往没有单纯明确的具体动机，相反，往往有一个宏大笼统的抽象动机。比如大兴县的屠杀，主事者事后交代，因为响应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号召。如果不把阶级敌人杀了，他们就会杀革命派。所以这些屠杀行为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残暴。你刚才提到的普遍人性问题完全变质，成了“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世界上只有中共是不遗余力批判人道主义的，毛认为苏联讲人道主义是变修的结果。阶级性和人性的对立是中共推行恶政的基本理由，也是文革中所谓“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理论基石。阶级性贯彻到党内，就是党性。用刘少奇的经典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问：这就好理解为什么河南这位法院院长要公开承认党性和人性相冲突时，要“只论党性”。

答：其实，党性在共产党党内斗争中，对迫害和受迫害者都有作用。其一，对迫害者而言，让他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找到了合适的借口，首先党性给他提供了迫害他人的政治正确性。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什么告密，什么背叛，什么落井下石，总之一切在道德标准下恶的东西都可以成善。其次，残存一点良知的人，恐怕对某些行为觉得下不了手。因为道德会有一种自然力量，这就是孟子所谓“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党性会给他非道德的力量来克服这种恻隐之心。弗洛伊德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来分析这种心理防卫机制。用一个高尚的观念来掩饰自己行为卑鄙，是合理化最常见的方式。党性是最有效的借口，这个概念可以把迫害变成拯救，把利己变成为人，把凶残变成善良。对受迫害者，这个概念也同样有效，它可以使屈服成为救赎，使人格扫地变成自我献身。斯大林导演的莫斯科大审判就是个好例子。当时旁观审判的西方记者不明白那些列宁的战友怎么会那样热情地承认自己是特务、间谍，那样努力证明自己是罪人。他们要懂了党性这玩意儿就会懂了。纳粹那些犯罪者在受审判时一般都会以服从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而文革中我们亲眼看到几乎全体中共官员都忙不迭地检查、揭发、交代，他们所信奉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就是表现自己“党性强”的合理化过程。

问：所以回想文革中发生的那些大屠杀，实行者几乎没有人忏悔，恐怕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答：对，像戚本禹这块料，至死都宣称自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一定相信自己的那些罪恶不过是党性强，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这种以所谓阶级立场，所谓党性来实行的罪恶也可谓“以理杀人”。清代大儒戴东原有一段话我极喜爱，他说：“宋以来儒者……其于天下之事也，以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他是批评宋代理学，以一套虚假观念断行天下事，害人无数，却永远冠冕堂皇。他愤怒地问：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那些文革中死于文革理论的无数冤魂，就是“死于理，其谁怜之”。和这套党性原则相反，人类文明自有正道，那就是人性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主权。雨果在《九三年》中有极其精彩的描述，旺代叛军首领郎德纳克侯爵是保皇党要犯，共和军首领郭文与他拼死战斗，一定要捉拿他。结果侯爵已经逃脱时，看到堡垒起火，而楼上有三个孩子。他毅然返回，救了这三个孩子而被捕。郭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了郎德纳克，而自己上了军事法庭被处以绞刑。那段描写真是惊心动魄。促使郭文背叛了自己的“党性”的原因，是他明白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共产党六十余年的毒化教育，让我们离善良、宽恕、慈悲、正义越来越远。但是，我倒不担心人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绝缘。中国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有向善之心，问题是共产党这套意识形态在暴力支持下横行九州。但这套东西一定会被人抛弃，因为说到底“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曾经说过，党性不过是理论化了的兽性，但不止于此，因为兽性还有自然

的一面，我们说“虎毒不食子”，说“舐犊情深”，这都是兽性的自然性。所以党性是抽掉了自然性的纯粹的残忍。共产党这套意识形态一旦垮台，你会发现它将像水泄沙地，一点痕迹都留不下。人心修复不要一代时间。

□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